

略论峨眉山苦行僧

徐 杉

提 要：本文探讨峨眉山苦修者的起源及原因，历代苦行僧的修行情况，苦行僧在峨眉山佛教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对西南地域佛教及民间文化具有的意义与影响。

徐杉，女，供职于四川省乐山市文化艺术研究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四川书法家协会会员。

关键词：峨眉山 苦行僧 佛教文化

苦行僧是指为信仰自我节制、自觉磨难、拒绝物质和其它欲望诱惑，甘愿忍受恶劣环境，以极其艰苦和痛苦磨砺行为作为修行手段的佛门僧人。

峨眉山是佛门僧人苦行修炼的地方之一。僧人把物质生活降到最低或极限，以此来追求心灵的解脱，摆脱无尽的轮回之苦。正因如此，苦行僧经千年而不衰，自第一个从印度到峨眉山的宝掌和尚，到唐、宋、元、明、清，大德辈出，代有其人。但是，史料对苦行僧在峨眉山佛教文化中的影响与作用记载不多，后人对其挖掘、研究也不够。苦行僧属于峨眉山隐逸文化的一部分，很难为世人所了解，在寥寥无几的文献资料中若隐若现，一笔带过，因而留下了一个空白。

佛教是古代印度文明的结晶，具有严密的逻辑，恢宏的理论，传入中国后与本土文化融合吸纳，又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峨眉山被称为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与其它地方相比既有共通性，又有特殊性，这种同异性是由地域文化和佛门修行传承互相影响、融合、发展的必然结果。

笔者在文学创作之余长年从事宗教调查，尤其是峨眉山佛门，曾采访过大量僧人，其中一些是清末和民国时期的老僧和大德，从他们口中了解到许多鲜为人知的隐逸文化历史，也有机会了解到其中很少为外人所知的一部分修行人——苦行僧。他们中有穷人，也有中产阶级，甚至达官

显贵。他们选择佛门后，便散尽家财，远离父母妻儿。他们在戒律之外还要给自己增加一些严格、甚至苛刻的约束。他们通常没有私人财产，在山里结茅棚，住山洞，垦荒种地，或者修庙劳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其中有一些特别的苦行僧，还以自己的身体供佛，锤炼意志，坚定道心，用另外的方式渡化众生。他们是一群以宗教思考为生命、具有神圣使命的僧人，是峨眉山博大精深佛文化中具有核心价值的代表之一。

2003年笔者根据自己多年的采访笔记，以及对文史资料的研究，写出50多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布金满地——神秘的峨眉山佛门传奇与揭秘》（第一部、第二部）^①。书中多处涉及到苦行僧，由于诸多原因，未将峨眉山历代修行的特殊群体——苦行僧进行深入的论述。因而，这部分隐修者的影响及作用尚未深刻地揭示出来。

那么，苦行僧在峨眉山佛教文化中到底有什么样的地位与作用？对西南地域佛教及民间文化有何重大意义以及重要影响？本文试图将笔者对峨眉山苦行僧的长期调查、考证、采访、研究的成果概要论述如下。

一、峨眉山苦修者的起源及原因

峨眉山的苦修行为方式起源于道家，道家认为通过苦行修炼可以接近天神和地神，了解宇宙万物的真相，进而获得长生不老之身。

历代许多道教、佛教大师之所以选择峨眉山

作为苦修之地，是因为峨眉山具备三大要素，即：自然条件艰苦、道教（道家）苦修传统、社会尊重苦修行为。

（一）自然条件艰苦

峨眉山云雾多，日照少，湿度大，森林密布，适合耕种的土地极少，仅根据四川省气象局《1951 年—1980 年全省地面气候资料整编集》载：“峨眉山山顶年平均气温 3℃，海拔 1600 米以上年平均气温 10.9℃，海拔 2000 米以上多降雪。”^②这种低温多雨气候不适合农耕，因而人赖以生存的食物极其匮乏。

另外，古时外界通往峨眉山的交通极为不便，唐朝李白也无奈地感叹：“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进入四面崇山峻岭环绕的蜀地难乎其难，到达峨眉山还需要忍受野兽侵扰，寂寞孤独，物质匮乏，饥饿疾病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因此即使一时冲动作出修道决定的人，最终也会知难而退，半途而废。能坚持到达目的地，必是为信仰作出的理性选择。

由于峨眉山食物稀缺，修行者不得不节衣缩食，以野果、植物根茎果腹；住山洞，结茅棚，或者在山林露宿。在清净中，端正行为，修养品德，获得精神自由和灵魂解脱；在戒欲、辟谷、瑜伽、忌口、避寒等一系列苦修中，摆脱对物质的欲望，减少对工具的依赖，使人回到半原始生活状态，以此将身体的潜能发挥出来，最终达到与天地宇宙沟通。现代科学研究证明，食肉动物与食草动物的主要区别在于消化道构造的差异，食肉动物的消化道较粗短，食草动物的消化道比较细长，而人的消化道就比较细长，这就表明人类祖先的主要食物来源于植物。这是人类起源后形成的主要习性。如果人回归这种习性，更容易激发生命中潜在的特异功能。

峨眉山当时的自然环境非常原始，到峨眉山的修行者不得不回归到原始习性中去，因此必然是苦修。

（二）道教（道家）苦修传统

峨眉山一直被视为神居住的地方，很早以前，就有人试图在这里接近天神和地神，以便通往他们的世界。据载，轩辕黄帝就是在峨眉山得道教始祖老子授道而成仙。“道家之原，出于老子……授轩辕于峨眉，教帝尝于牧德……”^③这是最早关于峨眉山道家的正史记载，具有极大的

典范效应，激励了后世许多人不辞辛劳来峨眉山寻“道”。这个“道”就是依据道家经典《道德经》诠释对宇宙万物的认识。

轩辕黄帝一直受到从官方到民间的敬仰，每年清明节祭拜黄帝陵是一项重要的活动，黄帝被视为是中国文化和道教的创始人。

道教的文献资料中有许多道家神仙在峨眉山修行的记载：如《列仙传·葛由传》^④说：“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时，好刻木羊卖之。一日骑羊而入蜀，蜀中王侯贵人追之上绥山……。”“绥山”是指二峨山，是峨眉山的一部分。当地人习惯按山峰高低次第称峨眉山为大峨山，二峨山、四峨山。

再如：春秋时期的名士陆通，他不但拒绝与孔子交谈，还以歌讽刺孔子：“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事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知知载；祸重乎地，莫知避之……。”后来陆通携妻到峨眉山避世，刻苦修炼，终于修得长生不老之身。“住宿峨眉山，土人于世见之，历数百年也。”^⑤

还有东汉时期的瞿君武，四川乐山犍为人，“七岁绝粒，服黄精、紫芝，入峨眉山四十年，师事天真皇人，得仙，乘白龙往来。”^⑥“天真皇人”，是指老子李耳。

那么，神仙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晋代葛洪在《神仙传》中这样描述：“仙人者，或竦身入山，无翅而飞；或驾龙乘云，上造天阶；或化为鸟兽，浮游青云，潜行江海，翱翔名山；或食元气；或如芝草；或出入人间而不识；或隐起身而莫之见。面生异骨，体有奇毛，率好深僻，不交流俗。”

道教的大师就具备以上特性，如陆静修、孙思邈、吕洞宾、陈抟等，他们都有在峨眉山苦修的经历，他们的行为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五斗米教之所以产生于四川，尊老子为教主，把峨眉山纳为一个教区，《云笈七签》^⑦中称峨眉山是道家的三十六洞天中的第七洞天，与峨眉山道家的典范效应紧密相连。

（三）社会尊重苦修行为

中国虽然是一个崇尚仕途的国家，但从古至今苦修者和隐士都是受尊重的群体，他们往往被看成神，或者是能与神对话的世外高人。当尘世

中的人希望从自然获取力量时就会想到他们，因为他们不受世俗价值观的左右，除解脱自在的精神境界外，还有过人的智慧才华，特异功能和洞察天地的能力。所以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愿意与他们结交，追随他们，供养他们，使自己及家人获得裨益。

如葛由去峨眉山时“蜀中王侯贵人追之上绥山”，最终“随之者不复还，皆得仙道。”^⑧。又如唐代高僧悟达（原名知玄），乐山洪雅县（现属眉山市管辖）人，曾任射洪县令，后出家为僧，隐居山林多年。“中和元年（881），黄巢起事，唐僖宗逃到成都，派人征诏知玄为驾前供奉。”还如：后蜀诗僧可朋，乐山丹棱县（现属眉山市管辖）人，县令欧阳炯“与他情趣相投，甚为友善……经常周济，为他偿付酒债。”^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切都在变化，而隐居深山的苦行者却固守传统，因而他们又被人们视为“根”加以尊重。久而久之，逐渐在当地形成地缘效应。如今，峨眉山以及周边地区百姓依然保留这种传统，许多人愿意结交出家人，供养出家人。每到收获季节或新年，不少农民将新鲜蔬菜、粮食、水果等送到寺院里。

因此，可以说是道家奠定了苦修的基础，而佛教传入峨眉山后，又与道教，儒家文化相互吸纳，融合发展，共同促进。中国的佛教徒吸取了道家苦修中的精华，又继承了印度早期佛教中的苦行精神，并在峨眉山不断发扬光大，因而先后涌现出以宝掌、淡然、继业、通天、无穷、可闻、普超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高僧大德。他们苦行济世，慈悲为怀的精神推动了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影响了上层建筑和社会大众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生活方式，使峨眉山不但成为佛教名山，而且赋予峨眉山更丰富的精神和文化内涵。

所以笔者认为，峨眉山苦行行为方式受到道家的影响，而发扬光大于佛教。

二、峨眉山历代苦行僧举要

（一）在峨眉山历代苦修僧人中，宝掌和尚是早期的代表人物之一。据载：“中印度人，生时左手握拳，掌生红字，七岁出家，魏晋年间入蜀，先在成都大慈寺翻译佛经，后到峨眉山礼普贤，在洪椿坪后的宝掌峰结茅棚修行……。”^⑩

峨眉山全国重点寺院洪椿坪，在今天是一个

颇有气势的庙宇，而在宝掌和尚结茅棚时还是野兽出没、人迹罕至的茫茫山林，宝掌峰是后人因他在此结茅棚苦修而命名。直到宋代才建起一座规模较小的寺院，名千佛庵，后经明清两代扩建才形成今天洪椿坪的格局。洪椿坪一带是峨眉山降雨最多的地方，终年云雾缭绕，细雨纷飞，宝掌和尚苦修的艰辛难以想象。古人有诗赞他曰：“劳劳玉齿寒，似进岩泉急。有时中夜坐，阶前神鬼泣。”^⑪

据宋僧《五灯会元》记载，宝掌和尚出生的年月相当于我国周烈王姬喜（前376—前369）在位期间，于公元657年圆寂^⑫，如此算来宝掌和尚在世1000多年。“魏晋间，入蜀留成都大慈寺，译注佛经……云游建业时，遇达摩入梁，便向达摩求法，佛理精进。梁武帝萧衍高其道德，延入内廷。”^⑬

（二）唐初，峨眉山普贤道场基本形成，佛教也因为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繁荣，佛经的不断翻译传播，新的思想流派和佛教宗派产生，进入兴盛时期。除峨眉山扩修和新修庙宇外，乐山的凌云山悬崖峭壁上开始开凿世界第一大弥勒佛造像；夹江通往乐山官道的崖岩上开凿千佛造像等。

唐代后期，四川密教的首领人物柳居直（846—907）也曾峨眉山苦修。他是嘉州龙游县玉津镇天池坝人（今乐山冠英场天池乡），据宋僧祖觉所立《柳本尊传碑》载：“柳本尊，名居直……州城北有柳生瘿，久之乃出婴儿。邑都州吏收养。既长，聪颖过人。父歿，以柳为氏，继父职……蔬食布衣，律身清苦，专持大轮五部咒，盍瑜伽经中略……诵数年而成功……。”^⑭

广明元年（880）黄巢进逼长安，僖宗皇帝出京入蜀，当时天下大乱，百姓饥馑，瘟疫流行，社会动荡不安，柳氏悲悯众生，光启二年（886）于佛前盟誓，要咒法消除苦难，并行“炼指”，将左手二指一节供养诸佛，以示救苦救难的决心。此举使他聆听到圣贤的指点，前往峨眉山苦修，曾在山顶的大雪中凝然端坐，欲仿效佛祖释迦牟尼六年苦行，寻求人生真谛与生死解脱。

此后柳居直有“将香于左脚踝上烧炼，愿众生举足下足遇道场永不践邪淫之地……挥刀断左臂，凡四十八刀方断，刀刀发愿，誓救众生，以

应弥陀四十八愿……。”^⑤

柳居直共有十炼割截自体的苦行，用以弘化密教，包括立雪、炼指、炼踝、剜眼、割耳、炼心、炼顶、舍臂、炼阴、炼膝等，同时他还竭力救助患病的百姓，不取丝毫钱财。蜀王王建听闻柳氏的举动大为感动，遣使前往慰问。大足“十炼图”就是表达柳本尊专诚一意，至忘其身的场面。

柳居直的苦行吸引了许多追随者，对四川密教的发展起到很大推动作用，所以被尊为密教的第六代祖师柳本尊。

（三）明代无穷禅师（1536—1603）是峨眉山“躬操苦行，忘身为法”^⑥的苦行僧代表人物之一。他是四川铜梁人，俗姓田，名真法，三十七岁时抛家弃子到峨眉山出家为僧。如今大佛禅院的前身大佛殿，以及位于万年寺脚下的慈圣庵就是无穷禅师主持修建的，其中大佛殿为当时西南最大的寺院，内有高达十二米的铜铸千手千眼观音。

无穷禅师忘身为法“绝人我，忘形骸，运柴执爨，不憚劳苦，众食毕乃食，仅糠粃而已……九老洞住年余，除持钵外，趺坐一语不发，心若死灰，形如槁木，恬然不以为意……燃三指供佛，燃身灯四十八炷，以表四十八愿；刺血为墨书《华严经》两部。见者无不嘬指。”^⑦

可是《峨眉山志》和《无穷大师塔铭》对他圆寂之事只有寥寥几个字：“示寂于延寿寺。”据考：无穷禅师是蒙冤而离世的。

1989年，国务院、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等单位，开展了建国以来最全面、最深入的民间文学集成，主要包括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三个部分。要求这套书基本上不收录现成书面资料，所有作品及相关资料均从田野调查中采录得来。从峨眉县民间收集的资料中，有两则有关无穷禅师传说的记载，大意是：无穷向万历皇帝的母亲慈圣皇太后化缘，欲铜铸千手千眼观音，慈圣皇太后是个虔诚的佛教徒，闻听此事后不但捐出私房钱，还让皇帝从内帑拨出一笔银子助修。无穷回峨眉后购得十余斤黄铜，原本打算运到慈圣庵供养，但是由于体积太大无法运上山，只好在县城建大佛殿供奉。工程结束后无穷进京禀报，万历皇帝随即派人悄悄来视察，可是来人走遍全山寺院都没有看

见铜铸的观音，于是禀报皇帝怀疑无穷私吞了这笔银子，皇帝闻讯大怒，于是不问青红皂白下旨将住在延寿寺的无穷斩首。后来万历皇帝得知真相追悔莫及，不但追封其为国师，铸金头赔罪，还派两个官员护送无穷的遗骨回峨眉山钵孟峰安葬^⑧。

笔者根据多年对无穷禅师的墓地考察，以及对通永老和尚、永诵老和尚等人的采访，确定此事的真实性可靠。峨眉山第一部山志是清康熙十一年（1672）由蒋超完成的，比较粗略，许多事件没有载入，而是口耳相传。

“延内使姜公苏公，发送灵骨回山。”^⑨从这个举动可以推测万历皇帝心有愧疚，所以派太监姜公公、苏公公护送无穷禅师的灵骨回峨眉山，但无人敢将此事诉诸文字，只能隐晦写入塔铭。

（四）至清代，峨眉山的僧人依然保持苦修的传统，只是因为文献资料太少，难以考证。仅从清代王廷诏撰写的《可闻禅师塔铭》可以洞悉一二。当时可闻一边协助师父贯之修建伏虎寺，一边资助太史蒋超编撰《峨眉山志》，并点校初稿。其弟子“徒寂玩，勤修密行，发愿寺之前后左右，广栽杉楠柏树。准《法华经》一字一株，待将来兴作之需。”^⑩《法华经》共有十万五千零四十八字，寂玩和尚就种植十万五千零四十八棵树，其工作量之大令人惊叹！被后人称之为苦修典范。如今古木参天，郁郁葱葱，百鸟和鸣，被称为“布金林”，是峨眉山一大出色景观。

上述大德“累苦”、“饥寒”、“舍身”、“炼指”等苦行，是为了破除身见、我执，表示愿为佛法彻底献身的精神，属于菩萨行，不是凡夫理解的“自残”。佛教并不提倡无意苦修，否认仅靠苦行就能获得解脱，但必须经历苦修的过程，才能更加深刻感悟佛法。

三、峨眉山苦行僧的影响与作用

峨眉山佛教文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近两千年的历史中，虽历经坎坷，如三次大的排佛、以及改朝换代的战争，但是依旧较为完整地传承下来。过去许多佛教兴盛的场所，今天已经荡然无存，或者只留下遗迹，而峨眉山能经久不衰，与苦行僧的影响与作用有很大关系，因为他们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自己的信仰，坚守自己特别的修行方式。

例如上面谈到的无穷禅师，他的师父通天大师就是一位苦行僧。“或为乞丐于窑中，或作头陀于树下，或卧幽壑深林，或坐险岩古洞，数十年间，了却大事……持水斋十年，色力愈壮。”^④《峨眉山志》载：“通天大师于千佛筑结草庵以居，建海会禅林，修葺大乘寺，开设祖师殿等，名震海内外，闻名于宫禁。”无穷禅师深受其影响，精进苦修，处处以师父为榜样。

再如，柳居直以苦行弘传密教，影响了不少人弃家追随，“蜀人德之，从其化而弃家，预门人列者，无虑数十人……”，邱绍一家“因感泣，誓志修行，夫妻二女俱来侍奉，不离左右。”受柳本尊影响最大的是南宋僧人赵智凤，他五岁出家，十六岁就“命工首建寿圣本尊殿……发誓弘愿，普施法水，御灾捍患，德洽远近，莫不皈依。凡山之前岩后洞，琢诸佛像，建无量功德。”^⑤赵氏一生“清苦七十年”，在大足建成一个近万尊造像的石窟群，使四川密教绵延了近四百年。

峨眉山古代苦行僧对近代和现代僧人修行，以及形成峨眉山佛教文化特有的价值观，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和作用。笔者在峨眉山做宗教调查时，了解到许多老和尚坚守信仰的苦行经历。以下选取几位老和尚有关苦行修炼的采访摘要作为例证。

（一）宽清老和尚（1914—2004）

采访时间：2003年4月。地点：峨眉山白龙洞。

宽清老和尚俗名辜祥明，四川乐山市辜李坝人。其父吸食鸦片耗空家产，只好把年仅十一岁的他送到峨眉山卧云庵出家，师从果琳和尚。

卧云庵位于峨眉山千佛顶，每年十月至次年二月常是大雪封山。宽清出家不久，果琳法师就叫他每隔一段时间去一趟万佛顶，为一位在那里结茅棚苦修的老和尚送一点米和盐。那时，万佛顶还是一片古木森森，藤蔓缠绕，人迹罕至的荒僻之地。很长时间宽清都不知道老和尚长什么模样，因为他总是静静地呆在茅棚中。一天，宽清又背米过去，但连喊了好几声茅棚里都没有回应，透过柴门一看，才发现老和尚盘腿而坐，低着头已经过世了。宽清跑回卧云庵禀告果琳师父，果琳法师一听二话没说，疾步去见他的师父——昌如老和尚。在清点那位过世老和尚的遗物

时，宽清看到一块银质免死牌和一张写有“右府将军”字样的委任书。昌如老和尚这时才告诉他们：老和尚法名霞光，现年94岁，俗姓李，是位战功卓著的将军，因舍命保卫皇帝而授免死牌。同治年间奉命率军到贵州黄平等地镇压苗民起事，因见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顿悟生命无常，于是抛家弃子，到峨眉山出家为僧。

霞光法师圆寂后其遗物就保留在果琳法师处，果琳法师不到四十岁就圆寂，宽清法师不知师父将李将军的遗物放在何处，但他遵照师父的嘱咐未将此事告诉外人，直到圆寂前才说出。

为了印证这段历史，笔者查阅了有关贵州苗民起事的资料，了解到事情的起始，也看到郭沫若对这段历史的描述：“我的外祖父杜琢章公是当时黄平州的州官。到任不久，便遇到苗民起事，致使城池失守，外祖父手刃了四岁的四姨，在公堂上自尽了。外祖母和七岁的三姨跳进州署的池子里殉了节，所用的男工女婢也都殉难了。我们的母亲那时才满一岁，刘奶妈把我们的母亲背着已经跳进了池子，但又逃了出来。”^⑥可是一直没有查到这位李将军的资料。

2004年峨眉山金顶重建，在挖地基时掘出许多用铜、铁、木等材料雕刻的人物，每个雕像上面都刻有俗家姓名，这是民间古老的祈愿方式。其中一个民工在掘土时发现了一块银质免死牌，上面刻有铭文。待笔者得到信息赶到山顶时，那位民工已携免死牌不知去向……根据知情人的描述，我推测极可能是那位李将军、后来的霞光法师留下的遗物。

当年李将军选择到峨眉山出家，就是选择苦修，想以此洗清自己的罪孽。霞光法师的苦行影响了宽清，宽清法师上世纪50年代因患雪盲未及时治疗而双目失明，可是他从没有因此而稍有懈怠。“文革”期间他被安排在白龙洞附近养猪，吃尽苦头，从无怨言。宽清法师以自己的行为影响了后人。

（二）永诵老和尚（1913—2010）

采访时间：1999年4月。采访地点：峨眉山万年寺。

永诵老和尚俗名张银山，四川遂宁人，1938年于峨眉山金顶华藏寺礼果玲上人剃度出家。

永诵老和尚刚出家不久，在一次下山运粮食时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押往凉山修筑乐西公路。

当时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横贯南北的平汉铁路、粤汉铁路以及对外联系的粤港交通都遭日军封锁，打通乐山到西昌的公路，再连接滇缅公路，是唯一通向国际的陆上通道。蒋介石为此下令：若不在 1940 年年底修通乐西公路，将以贻误军机论处！但是乐山至西昌皆是崇山峻岭的大小凉山，只有马帮行走的蜿蜒陡峭山路。为了抢修这条路，征集了十四万民工，由于施工条件恶劣，仅打通蓑衣岭一处就死伤三千多民工。除此之外，他们还时常遭遇地方民团、土匪的武装袭击，有一次遭遇土匪袭击，他所在的连队只余 20 多人。永诵老和尚在被抓三年以后，历经千辛万苦逃出国民党军队，回到峨眉山华藏寺。

在采访中，他对这段经历的说法是：修习头陀苦行。法师自小习武，尤善使棍，七十多岁时还坚持每天黎明前在万年寺后山林中舞弄。他常以“苦老人”自称，言语中充满以苦为乐的淡定和超脱。

永诵法师的行为对后来的僧人影响很大，一位接受笔者采访的中年僧人讲，自己初出家时很难适应每天四点起床早课，经常找借口多睡一会。一天早课前，他无意间看到永诵老和尚在林中习武，后来出于好奇，偷偷去拿老和尚的齐眉棍想舞弄一下，不料却是根沉甸甸的铁棍。这件事给他很大的震动，从此奋发努力。

（三）常清老法师（1911—2001）

采访时间：1998 年 7 月。采访地点：峨眉山伏虎寺。

常清法师是四川峨眉燕岗村人，俗名燕有华，17 岁在燕岗风火殿出家，1956 年，峨眉县四乡九庵 21 位比丘尼被集中到伏虎寺，常清成为第一位比丘尼住持。

最初她们在伏虎寺过着农禅并举的生活，种田五亩三分，菜地三亩，萝峰庵后旱地八亩，以后又在大雄宝殿后开荒八亩，每年还要向国家交八头生猪，国家每月补助每人两元生活费。可是“文革”动乱期间，她们的生存方式受到批判，分批被遣散，或者强制离开，然而常清法师在没有粮食，还要受辱挨打的情况下坚持留守寺院。当红卫兵企图砍伐伏虎寺外的布金林时，常清法师冲上前抱着树干说：“要砍树子就先砍死我！”与常清法师一同坚守下来的共有六位比丘尼。

我曾问她如何在绝望中坚持苦修的？她说只

要有信仰，就会把吃苦受累当成是修行，就不会绝望。

常清法师的师兄常真老法师也是如此，当国家恢复宗教政策后，已经是七十三岁的她自告奋勇去恢复废弃的中锋寺。当时这座曾经被誉为山中六大古寺之一的寺院，佛像倒塌，满地瓦砾，杂草丛生。殿堂内外门窗全无，大雄宝殿被人改搭成两层，上为鸡舍，下是牛圈，臭气熏天的鸡屎牛粪溅起半墙高，污浊不堪。常真法师每天天不见亮就带领两个考察生一背篓、一背篓往外运垃圾瓦砾，仅清理大雄宝殿内的鸡屎牛粪就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如今九十五岁的常真老法师回忆起这段经历没有一丝怨言，说峨眉山普贤菩萨代表“行”，苦行可以消除自己的孽障，苦中有乐。

峨眉山的苦修行为之所以能一代代传承下来，笔者认为是基于对“苦”的认识和理解。人的享受分为三个层次，即物质、精神、灵魂，祖师大德们在学佛过程中得到了最高层次的灵魂享受。到达苦中有乐，苦尽甘来的境界。对于物质的“苦”，在灵魂上却是一种超然的乐，所以能“苦”之泰然，“苦”之超凡脱俗。另外，苦行僧受到世人的敬仰和尊重也是能传承下去的因素之一，即便不信仰佛教，或者对佛教有偏见的人，也会被苦行僧的坚强意志，或过人的智慧所打动。

从古至今，峨眉山的佛教文化长盛不衰，声名远播，越来越兴旺发达，不仅对西南地域的佛文化、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生活方式、民风民俗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还对社会文明、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的进步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因此，可以说苦修方式是峨眉山佛教文化的核心之一，精髓之一，根本之一。

虽然现在峨眉山的僧尼都归入寺院，不允许在山里结茅棚、住山洞，物质生活也有保障，但是苦修的精神依然在传承。笔者在采访中青年僧人时，得知他们中间有的人原来家境相当富裕，有的具有较高的学历，有的多才多艺。他们（她们）原来本可以选择各种各样富足的生存方式，可是到峨眉山出家后，就意味着选择了吃苦，一切都得从吃苦磨练开始。

四、苦行僧对民间文化的推动

乐山民间文化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这是因

为受到举世闻名的乐山大佛、佛教圣地峨眉山的佛文化影响。而乐山大佛和峨眉山能被联合国列为“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又是因为有深厚的民间文化铺垫滋养，二者相辅相成，交映生辉。

例如，受到佛门“苦修”的影响，民间通常把悲剧说成“苦戏”，把磨练说成是“吃苦”。还延伸出许多与“苦”有关的词汇，如“苦相”、“苦命”、“苦海无边”、“苦心孤诣”、“苦口婆心”等等。民间认为“苦”不等同于“悲”，“苦”是一个过程，是一种锻炼，有时是一种有意而为的行为，因为苦中有乐，能忍受苦难的人，终究会苦尽甘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里的“人上人”是指受尊重的人。

1989年全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仅乐山市中区收集的173个神话、传说、故事中，有关道家神仙的有30多个，关于大佛与僧侣的有30多个，讲劝善弃恶因果报应的有40多个。在峨眉收集的143则神话、传说、故事中，关于佛门的50多个，关于道家神仙的20多个，关于因果报应的有30多个^④。在这些传说中涉及到苦行僧，也涉及到类似苦行僧，但却表达儒家孝道、道家修行的内容。比较突出的有如下几个。

（一）海通和尚

海通和尚为修乐山凌云山弥勒大佛剜目拒贪官的故事，一直在民间流传，因为无法从正史找到记载，也就一直当作民间传说。直到1984年意外发现了公元803年留下的石碑，即剑南节度使韦皋撰写的《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才印证了传说的真实性。

乐山的文学艺术家根据碑记，将海通和尚的故事改编成《大佛传奇》《天下第一大佛》川剧、话剧，不但在本地演出，还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地巡回演出。同时，还创作了以海通和尚为主角的长篇小说，电视剧本；设立大佛开凿、海通人物研究的社科课题；凌云山上雕塑海通的形象。如今，海通和尚不但在乐山家喻户晓，而且在整个四川甚至西南传播十分广泛。

海通和尚既是一个受人敬仰的苦行僧，也被视为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的精神象征，还被视为与乐山峨眉山“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相连的文化符号。

（二）柳本尊

乐山天池坝直到宋代还保存着柳本尊的遗

迹，乐山地方志载：“天池院观音柳居士，门前有一井，尝剜一目舍于井中，俗人目盲，取水洗之即愈。”^⑤

清乾隆年四十二年（1777）间天池坝杨姓人家建起一座占地2230平方米、两进四合院布局的杨祠堂，将井圈入其中。后来杨祠堂所在地改为天池小学，学生患近视眼的较少，当地百姓传言是因为饮用了柳本尊舍目的井水所致。如今杨祠堂已列为乐山市文物保护单位，学校迁出另行选址。

据《宋僧著述考》载：立《柳本尊传碑》的僧人祖觉乃“嘉州龙游人（今乐山）人，俗姓杨，早年慕韩愈，撰文排佛，后因疾从弥勒慧目能禅师。”《大明高僧传》中记载祖觉：“尝修《北宋僧史》、并《华严集解》、《金刚经注》、《水陆斋仪》等行世。”^⑥祖觉是柳本尊的追随者，也是佛文化的传播者。以柳本尊为核心内容、反映四川密教历史的大足石刻，如今被纳入世界文化遗产。

（三）苦行孝道

中国是一个儒释道并举的国家，孝道，是儒家的核心内容之一，2000多年来成为中国文化的复合概念，既有文化理念，又有制度礼仪，包含修身养性，和睦家庭，报国敬业等。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两传统道德行为准则之一，另一个传统道德行为准则是忠。而在民间则被理解为善待父母长辈，宽容善良，忍辱负重。

在峨眉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有不少讲述孝道的故事，而内容却与佛门的苦行有关联，如峨眉《千手观音》，是讲三公主割自己的手臂为父亲治病的故事。《峨眉县迁县城的传说》是讲一位奶奶逗孙儿，佯呼“孙儿打奶奶”被微服的巡抚发现，认为长辈教子无方，小辈忤逆不孝，一并治罪，借以纠正民风。《两先后》是讲述好媳妇与恶媳妇截然不同报应的故事。峨眉山这些故事反映了孝子的孝行，以及当时社会的伦理道德，在民间流传极广。与元代郭居敬编撰《二十四孝》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共同之处在于苦行孝道皆有后福，不同之处在于苦行孝道的后福前者是帝王给予，而后者是佛菩萨给予；前者是升官发财，后者是修庙建寺。

由此看出佛教精神通过民间故事的形式，不但通俗易懂地向大众传播，也使民间因果报应的

故事内容丰富多彩,同时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传统美德发扬光大。

结 语

综上所述,峨眉山的苦行僧从古至今,代有高僧、大德辈出,造就了这座佛教名山。他们以苦行实践充实佛教理论,又以佛教理论指导苦行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又不远万里去印度取经,使这种外来宗教日益成熟,与本土产生的道教并存于峨眉山。道教终极目的是要修出一个长生不老之躯,佛教是要放下对身体的执着,两家在纲领和修行目的上的差异,使双方在融合之后又分化,分化之后此消彼长。唐代以来,随着佛教理论的更加完善,发展出新的修行门派,八个宗派中最有影响力的两个法门——净土宗和禅宗,在峨眉山繁盛起来。之所以如此是净土宗实际创始人善导(613—681),禅宗的实际创始人慧能(638—713)都有苦行修炼的经历,使峨眉山的苦行僧在对佛法与世界的认识上,很容易与他们产生共鸣。虽然佛教的八个宗派彼此相通,但是峨眉山的大德高僧们认为这两个宗派更适合峨眉山的人文与自然环境,于是积极倡导推广。加之历代苦行僧的人格魅力和慈悲济世,对大众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因而峨眉山影响了周边地区以及西南地域的佛教文化传播,并逐步形成其中心,最终成为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

与此同时,峨眉山苦行僧也推动了当地民间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而民间文化又丰富了佛教的表现形式。使苦行僧受到大众的尊重和推崇,形成吃亏是福,善恶有报,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如基因密码代代相传,使苦行成为峨眉山佛教文化的特征之一,也是与众不同的亮点之一。

今天,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然而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拜金主义,贪图虚荣,奢靡享乐的倾向愈来愈严重,僧侣队伍中也有极少数人出现贵族化倾向。因此,继承和发扬苦行僧精神不仅对佛门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保持中华民族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吃苦耐劳、惜福奉献的美德,对倡导低碳环保新的生活方式,构建和谐社会也有积极作用。

(责任编辑:無 邑)

- ①徐杉:《布金满地——神秘的峨眉山佛门传奇与揭秘》(第一部、第二部),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版,2004年9月版。
- ②峨眉山志编纂委员会:《峨眉山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96—97页。
- ③《魏书·释老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卷114。
- ④[汉]刘向:《列仙传》卷上《葛由传》。中华书局,1991年。
- ⑤[汉]刘向:《列仙传》卷上《陆通传》。中华书局,1991年。
- ⑥峨眉山志编纂委员会:《峨眉山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313页。
- ⑦[宋]张君房辑:《云笈七签》,齐鲁出版社1988年版。
- ⑧[汉]刘向:《列仙传》卷上《葛由传》。中华书局1991年版。
- ⑨乐山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乐山历代人物传略》,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18、22—23页。
- ⑩峨眉山志编纂委员会:《峨眉山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244页。
- ⑪峨眉山志编纂委员会:《峨眉山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244页。
- ⑫[宋]普济辑:《五灯会元》,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 ⑬峨眉山志编纂委员会:《峨眉山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244页。
- ⑭《柳本尊传碑》,现存大足宝顶山小佛湾。
- ⑮《柳本尊传碑》,现存大足宝顶山小佛湾。
- ⑯峨眉山志编纂委员会:《峨眉山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247页。
- ⑰[明]王在公撰:《无穷大师塔铭》,现存峨眉山。
- ⑱《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峨眉县资料集》,1989年内部印刷。
- ⑲[明]王在公撰:《无穷大师塔铭》,现存峨眉山。
- ⑳[清]王廷诏撰:《可闻禅师塔铭》,现存峨眉山。
- ㉑[明]王在公撰:《通天大师塔铭》,现存峨眉山。
- ㉒[明]刘畋人撰:《重修宝顶山寿圣寺记碑》,现存大足宝顶山。
- ㉓郭沫若:《芭蕉花》,《郭沫若全集》文学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0页。
- ㉔《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乐山市中区资料集》、《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峨眉县资料集》,1989年内部印刷。
- ㉕《嘉定府志》,清同治三年修。
- ㉖李国玲编著:《宋僧著述考》,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8页。